

泉州天后宫的历史嬗变与 文物价值研究^{*}

◆ 何振良

(福建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所)

◆ 范正义

(华侨大学海外华人宗教与闽台宗教研究中心)

摘要: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泉州天后宫的历史嬗变,有助于阐释泉州妈祖信仰与中国海洋文化之间相生相长的关系。明清时期天后宫在拓建、重修中刻意维持了元明时代的建筑规制和风格,使得泉州天后宫作为文物具有了真实性的特点。而历代朝廷、地方官方以及基层信众活跃于天后宫的事实,又使得天后宫作为文物具有了人民性的特点。真实性和人民性,是泉州天后宫在“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中的支撑作用的两大表现。

关键词:泉州天后宫;历史嬗变;文物价值

Abstract: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ianhou Temple in Quan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ong period of time is helpful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ief of Quanzhou Mazu and Chinese Marine cul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building regulations and style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ere maintained deliberately i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Tianhou Temple, which made Quanzhou Tianhou Temple as a cultural relic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thenticity. The fact that imperial courts, local officials and grass-roots believers were active in the temple also made it a cultural relic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ional character are the two major manifestations of Quanzhou Tianhou Temple's supporting role in the application of "Quanzhou: World Marine Trade Center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of China".

Key Words: Quanzhou Tianhou Templ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宋元时代泉州海外贸易极为繁盛,泉州天后宫见证了泉州港在宋元时代走向繁荣兴盛的历史过程。反过来看,宋元时代泉州港的繁盛,也奠定了泉州天后宫在妈祖信仰发展史中的“始发祥”地位。明初郑和下西洋,以及遣使海外,中国海洋文化继续发展,泉州天后宫也依旧辉煌。但在明中后期,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国海洋文化的退却,泉州天后宫也一度衰落。清初台海地区军事政治局势风起云涌,泉州天后宫再次得到官方的重视。关于宋元时代泉州天后宫与泉州港之间的互动关系,天后宫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已经有不少学者做过论述。但是,很少有人对自宋至清泉州天后宫兴衰嬗变的历史做一长时段的考察。今天天后宫景观的形成,是宋以来历朝历代不同人群活动堆叠的

结果,如果不对历朝历代不同人群的活动做考察,就无法深入理解天后宫的价值,也无法弄清它在今天“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支撑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拟在阐述自宋至清泉州天后宫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该宫的价值所在(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并对其在“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中的支撑作用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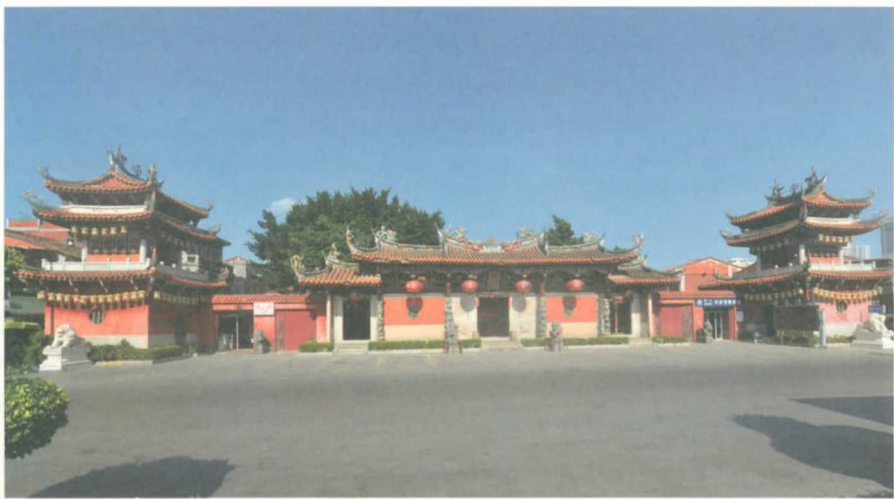
一、宋元时代泉州港的繁盛与泉州天后宫妈祖信仰“发祥地”的确立

泉州处于江海交汇之地,是终年不冻、四季可行的天然良港,而且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妈祖信仰网络研究”(17BZJ041)资助。



图一 泉州天后宫全景



图二 泉州天后宫山门

海舶从此地不仅便于进入印度洋诸地，前往朝鲜、日本等地也十分快捷^①。优越的港口条件，使得泉州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外海上交流的一个重要口岸。唐开元以后，泉州治所从丰州迁徙至今泉州市区。此时，已有不少外国蕃商与使节往来泉州。南唐时期留从效任泉州节度使，多次“招徕海上蛮夷商贾”，鼓励泉州商人出海贸易。北宋初，朝廷于广州、杭州、明州等置市舶司。元祐二年（1087年），鉴于大量海船私自进出泉州，宋王朝增置泉州市舶司。南宋仅存半壁江山，财政上更加倚重市舶之利，故更重视海外贸易。此时，大量蕃商云集于泉州城南贸易。元朝建立以后，游牧民族出身的统治者视野更加开阔，逐利意识更浓，对沿海港口的海外贸易更为看重。元王朝在占领泉州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1277年），就在泉州重建市舶司。

蒲寿庚乃泉州地方豪强，亦官亦商，宋末借官员身份大规模开展海上香料贸易，合法或非法地获取巨大商业利益。蒲寿庚降元后，元王朝鉴于其经营海上贸易多年，封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等职。蒲寿庚精通阿拉伯语、占城语（今越南），在海外诸国穆斯林海商中有一定的威望，这导致他主泉州市舶之后，“擅番舶利者三十年”，泉州也由此发展成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第一大港。随着泉州港的繁荣，泉州的行政地位也在提升，城市也跟着扩容。至元十五年（1278年），泉州升格为泉州路总管府。大德元年（1297年），又于泉州建置平海行中书省。由于城南乃是海商人泉州必经之地，贸易繁荣，泉州罗城进一步向城南拓展，建德济门，将原位于城外的天妃宫囊括入城内。



图三 泉州天后宫戏台



图四 泉州天后宫正殿

宋元时代泉州港的繁荣,吸引了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的番商前来贸易。今天泉州发现的宋元碑刻记载的穆斯林来源,就有也门、哈姆丹、土耳其斯坦的玛利卡、亚美尼亚的哈拉提、波斯的施拉夫、设拉子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波斯的为数最多^②。此外,泉州本土官民下洋贸易者也很多。泉州靠海,地方斥卤,不宜稻作,为求生计,泉州人多下海贸易。泉州的一些族谱中常见“贩在南洋”“商游吕宋”之类的记载。如《泉南芦川刘氏族谱》记载,刘氏二十三世家人往吕宋等地经商,获厚利之后,子女大多外出,至二十四世开始“兄带弟”外出经商。泉州设有赵氏南外宗正司,赵氏皇族子弟也兴贩牟利,参与海上贸易。元代形成了“官本船”贸易模式,“即官方出资打造海舶,再任命商

人经营贸易,以此将海外贸易财富垄断于官方之手^③。

严格来说,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来的番商多为穆斯林,他们信仰真主安拉,不崇拜其他偶像。但是,宋王朝为了体现其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从国家祀典的角度出发,需择一海神进行祭祀,并祈求海神保护商舶往返顺风。况且,不少泉州官民出洋贸易,他们也需要中国海神的庇佑。位于泉州城西丰州九日山延福寺,被宋代泉州郡守和市舶司选定为每年“冬遣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祭典的举办地点,泉州东南郊法石真武庙被选为祭海之处。延福寺的通远王,由此被视为泉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海神。乾隆《泉州府志》记载通远王从神陈益,系元丰间(1078—1085年)随泉州郡守到延福寺祈风时,感佛之灵而舍身成佛的。目前丰州九

日山祈风石刻落款时间最晚的是南宋咸淳丙寅年(1266年)。可见,从北宋元丰至南宋咸淳的近两百年时间,通远王一直是泉州官方最为青睐的海神。

值得注意的是,在泉州官方择定通远王为祈风祭典的海神时,诞生于莆田湄洲岛的妈祖信仰于元祐丙寅年(1086年)传播到了宁海圣墩。在圣墩李氏族人保义郎李振的媒介下,妈祖因护佑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而被宋王朝敕封“顺济”庙额,由此进入宋王朝的官方视野中。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江口立庙。绍兴三十年(1160年)白湖又立庙。江口、白湖二庙也极为重要,因为二庙的妈祖御寇、救疫等灵迹,妈祖信仰多次获得宋王朝的褒封。可以说,12世纪中叶以后,妈祖已经成为宋王朝官方祀典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海神。此外,自莆田圣墩庙建后,妈祖的信徒从原来的渔民,扩及海商巨贾。绍兴二十年(1150年)廖鹏飞在《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写道:“商舶尤借以指南,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④。该庙记还介绍了宁江大海商洪伯通海途中遇风得妈祖救助之事。此外,宋洪迈《夷坚志》记载莆田海口(疑为江口)林夫人庙,“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杯珥,祈阴护,乃敢行”^⑤。由上可见,12世纪中叶以后,妈祖已经是海商巨贾极为崇信的海神。

如前所述,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宋王朝增置泉州市舶司。南宋以后,宋王朝在财政上更加倚重市舶之利,大量蕃商云集于泉州城南贸易。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一些已经信仰妈祖的海商巨贾在泉州活动时,一定会把妈祖信仰带到泉州。所以,“宋庆元二年(1196年),泉州浯浦海潮庵僧觉全,梦神命作官”^⑥,绝非空穴来风,而应是海潮庵僧人觉全在接触了海商巨贾,了解到他们的妈祖信仰之后才有的举动。当时选择的建庙地点是在浯浦,而非城内,是因为浯浦是海商登陆后进入泉州的必经之地,“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⑦。庙建于此,可以给海商们登陆后祭拜妈祖提供方便。

泉州天后宫初创之时并不起眼,当时“推里人徐世昌”倡建,徐世昌乃一介里人,并无官职,说明该宫创建之时乃是一个民间小庙。但是,随着泉州港的日渐繁荣,登陆后从浯浦进入泉州城的商贾越来越多,以及妈祖信仰在朝廷祀典中的地位的不断攀升,泉州天后宫逐渐重要起来。延福寺在泉州城西十余里的九日山,泉州郡守、市舶使举行祈风祭典时,均需乘潮水往返,交通甚是不便。而真武庙,从南门出城后仍需往东再行数里。所以,当泉州官府有事需求助于海神时,改至城南门外的泉州天后宫祭拜妈祖,更为方便。我们认为,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对于增强泉州天后宫在地方官府中的影响有着很大的作用。如真德秀任泉州郡守时,曾因海寇为害问题祝祷于通远王、灵著王,但这次祝祷他并没有亲至,而是“委邑令,致祷于祠下”。

他也曾因为海寇为害两次祈求于泉州天后宫妈祖,从祝文内容提供的信息来看,两次他都是亲至祭祀:

《圣妃宫祝文》:“某猥以非材,再守兹土,实惟神庇是依。今者,凶狡之徒,方舟南下,所至剽掠,重为民旅之害。某既调兵以逐捕矣,于惟圣灵,丕赫振耀,凡航海之人,仰恃以为司命。是用祇遣官僚,敬伸忱祷。昔者,戊寅之役,盖尝赖神以有济。今舟师追贼,行且相及,正仰资圣力之时,惟神繁之维之,使不得遁,王师大捷,一网弗遗。鲸波晏清,如行枕席之上,皆神之大惠也。某之报谢,其敢弗虔。谨告!”

《圣妃祝文》:“天下之至险者,莫如海道,而至不仁者,莫如盗贼。以至不仁之徒,而凭至险之地,其为生灵之害,可胜计哉!某再忝郡符,方将与民相安于无事,而自春徂夏,寇至再焉。前者,自北而南,仅能小挫其锋。今复自南而北,僥不大惩艾之,而方来之患,未有穷已。是用纠合熊虎之旅,俾往殄鲸鯢之群。惟圣妃神灵烜赫,凡航海之人,赖以以为司命,是有用焉。导王师以必胜之机而挤狂寇于必败之途。如前日之所祷者,非圣妃其谁望敢。俯伏以请,谨告!”^⑧

由上可以推论,在妈祖地位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下,泉州天后宫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是其在宋代逐渐获得地方官府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郡守邹应龙用外商修建泉州城楼的余资修建横跨晋江之石桥时,将桥命名为顺济桥。“顺济”乃妈祖首次封号,这也说明当时泉州天后宫在地方官府中的影响甚大。惟其如此,泉州郡守才会用妈祖的封号来命名该桥。

入元以后,元王朝试图通过推崇妈祖来抵消前朝海神通远王的影响,泉州天后宫的地位因此而陡然提升。《元史》卷10“世祖纪”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壬子,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⑨。此时元王朝刚刚灭掉南宋,大规模的漕运则尚未开始,因此元王朝在这样的时候敕封妈祖,并将妈祖称为“泉州神女”,无疑是对妈祖在泉州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的肯定。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王朝因妈祖“保护海道,舟师漕运,恃神为命”,派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蒲师文乃蒲寿庚之子,兼任福建市舶(设于泉州)提举,负责泉州海外贸易。元王朝以蒲师文为册封使,很明显是出于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原因。此外,此次敕封诏书中有“有司奏请”之语,有学者据此认为是蒲师文以“有司”的名义奏请敕封的^⑩。也就是说,此次敕封乃蒲师文一力促成。

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癸丑,元王朝“诏封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图五)。林清标《敕封天后志》载此次敕封诏书曰:“利涉洪涛,显造化难名之德;尊崇懿号,传神明不朽之荣。申锡崇章,宜为殊典”^⑪。元王朝此次敕封中仍将妈祖称为泉州女神,且敕封是



图五 泉州天后宫正殿妈祖神像

为了褒扬妈祖“利涉洪涛”之功绩,表明此次敕封是针对泉州天后宫而作出的。

海运是元代南粮北调的主要方式。海运常有风涛之险,为祈求平安,元王朝大力推崇妈祖信仰,不仅多次敕封妈祖,而且常常派遣官员到全国各地主要妈祖庙祭拜妈祖。例如,天历二年(1329年)因海运损失甚大,元王朝遣翰林直学士布雅锡理、艺文监太监宋本二人巡回南北,祭祀从直沽到泉州的15座妈祖庙。其中,谕祭泉州天后宫祝文云:“圣德秉坤极,闽南始发祥。飞升腾玉辇,变现蔼天香。海外风涛静,寰中麟凤翔。民生资保锡,帝室藉助勤。万载歌清宴,昭格殊未央”^⑩。祝文是朝廷礼部官员根据各个妈祖庙不同职能特点而专门撰写的。如本次谕祭平江庙、昆山庙、路漕庙(刘家港)、杭州庙、越庙、庆元庙、永嘉庙的祝文,无一例外都提到了这些庙宇在庇佑海运方面的功绩,因为这些庙都位于南粮北运的海岸线上。泉州天后宫不在海运线上,而在东南沿海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所以祝文体现了泉州天后宫独有的职能特点。祝文称“海外风涛静”,即妈祖庇佑海外贸易平安。“民生资保锡,帝室藉助勤”,指明妈祖护佑海上贸易,保证了民众的生计,也保障了元王朝的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是,祝文中称泉州天后宫为妈祖信仰的“闽南始发祥”。众所周知,妈祖出生、飞升于莆田湄洲岛,湄洲妈祖祖庙是全世界第一座妈祖庙,湄洲是妈祖信仰的发源地。祝文中将泉州天后宫称为妈祖信仰的“发祥

地”,其义与“发源地”不同,它指的是妈祖信仰得以发展、提升、发扬光大的地方。妈祖信仰从湄洲起源,传播到莆田圣墩、江口、白湖之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宋代莆田的经济不强,海上贸易规模也较为有限。因此,妈祖作为海神,其信仰要获得更大的提升与发展,就需要转移到一个海上贸易更加发达,更能发挥海神作用的地方。泉州是当时东方第一大港,“涨海声中万国商”,海外贸易极为繁盛发达。妈祖信仰借助于泉州港平台,其信仰传播到海商番舶所到的世界各地。从这一角度来看,泉州天后宫将妈祖信仰发扬光大,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妈祖信仰的“始发祥”之地。正如李少园先生所见:“从湄洲岛宁海镇,到白湖水市直到世界大港泉州,一次次都是往交通更方便、经济更发达的地方迁移,以求得传播的更大优势。所以从本质上说,庙址的选择、迁移,完全受社会经济大背景的决定和制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祖庙的建立,与其说是神的选择,毋宁说是社会的选择、历史的选择”^⑪。

二、明清中国海洋文化的兴衰起伏与泉州天后宫的嬗变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禁止私人下海贸易,但对于官方的海外交往活动却加以鼓励。如明初朱元璋向周边国家遣使通好,通报改朝换代的信息。明成祖朱棣继往开来,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为扬威海外,朱棣遣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朱棣还分派使节,结交海外各国。

明初统治者推行的政策,使得妈祖得以作为海上交通的保护者而得到明王朝的推崇。泉州是出使海外的使者放洋出海的港口之一,使者出发前都要在泉州天后宫祭拜妈祖,该宫也因此受到明王朝的重视。万历《泉州府志》载,“永乐五年(1407年),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拓之,而宫宇益崇”^⑫。顾珀《重修泉州天妃宫记》载,“国朝永乐十三年(1415年),少监张谦使渤泥,得番州,发自浯江,实仗神庥,归奏于朝,鼎新之。”这些记载说明,泉州天后宫妈祖在明初仍然受到明王朝的大力推崇。朝廷的重视,也引发地方官府的效尤,“成化甲午(1474年),郡守徐侯源垦田地二十余亩,以供香火之费”^⑬。

明代中后期,朝廷的外交政策趋于保守,海禁越来越严厉,再加上泉州港口通航条件的恶化,妈祖失去了发挥影响的平台,泉州天后宫不再受明王朝重视,其地位一度衰落。顾珀《重修泉州天妃宫记》记载,到了嘉靖年间,泉州天后宫“历岁既久,寝以倾颓,有欲图形胜而庐其居者矣”^⑭。对此,王慎中《修天妃宫记》中有更详细的记述:“阅岁积坏前廊,后室圯而为墟,惟门堂存耳。而桷剥榱倾,支朽楹,茨颓垣,以御风



图六 泉州天后宫寝殿

雨殆不蔽也,其不至于燬无几矣”^⑩。妈祖托梦邑人徐概,请其重修。徐概父亲徐毓认为泉州天后宫“实郡城诸水会归之处,盖堪舆家所谓水口,关系匪轻”,遂捐资倡首,向民众募捐,并令其子徐概“董其役”^⑪。重修工程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兴工,但由于工程浩大,民众捐款有限,“门廊犹不能兴也”。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泉州知府童汉臣捐俸助建,重修工程才全部完成,天后宫重现“高门将将,廊序有列”的景象。^⑫重修后,顾珀、王慎中各撰有重修庙记。顾珀《重修泉州天妃宫记》通过强调明初泉州天后宫的辉煌,以及回顾明成祖《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记载的妈祖海上护佑册封使的事迹,来赋予这次重修活动以合法性。王慎中《修天妃宫记》则本着儒家理性主义观点,认为“极治之国,其神不灵”,在童汉臣治理下,泉州“灾厉不生,寇贼销逃,遗四境以安乐生全之福,神将无以为灵”。既然泉州吏治清明,民生安乐,不需要妈祖庇佑,为什么还要重修天后宫呢?王慎中认为是为了“存其教诱之勿邪之义欤”^⑬,即利用鬼神之说来警戒百姓勿走邪路。从两庙记的内容来看,明中后期,天后宫已经完全失去了它在宋元时代以及明初的那种护佑海上平安的职能,泉州民众自发起来重修天后宫,或是为了保护泉州风水,或是为了方便民众在庙中“报享”。而官方后期的介入,只是出于对明初妈祖庇佑册封使事迹的回忆,或是为了协助官府达到神道设教的目的。

入清以后,妈祖在台海军事风云中大放异彩,施琅平定台湾时妈祖有涌泉给师、涌潮济师等灵迹,由此受到清王朝褒封。施琅水师驻于晋江围头时,妈祖有助顺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遣礼部郎中雅虎到围头致祭。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翰林海宝、徐



图七 泉州天后宫藏明代妈祖神像

葆光奉使琉球还,以妈祖默佑封舟有功,奉旨列入春秋祀典。泉州天后宫于同年“奉行始人祀典。每岁颁行祭费银四两二钱,于春秋仲月吉日致祭”^⑭。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起事。忠勇公福康安奉旨平乱后,又向朝廷奏报妈祖灵迹。妈祖再次得到清王朝敕封、赐额。徐汝澜嘉庆六年(1801年)任晋江知县,曾到天后宫祭拜妈祖,从当地父老口中得悉妈祖事迹甚详。后调任台湾知府,往返台湾海峡时得妈祖庇佑,心怀感恩。嘉

庆二十年(1815年)调任泉州知府,他在天后宫奉行春秋祭祀时,发现该宫“栋宇滂漫剥蚀,非复旧观,殊不足以妥神灵而彰祀典”。于是他“亟谋所以新之”。对于徐汝澜的倡修之举,泉州民众“感念灵贶”,给以积极回应,“亦竞于趋事赴功焉”。官民双方“相与鸠工庀材,朽者易之,缺者补之,自内至外,治以塋茨,节以丹雘,而殿之大柱,并易以石,以期不朽,亦庶几轮焉奂焉,克符旧制矣”。本次重修,是官民合作的结果。知府徐汝澜有倡首之功,泉州民众则出钱出力。因为天后宫不仅是官方“岁时致祭之地”,更是“庶姓所瞻依者”^②,即民众膜拜祈福之地。

三、泉州天后宫的文物价值及其在申遗中的支撑作用

泉州天后宫是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妈祖庙,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天后宫的文物价值,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论述。但是,这些学者大多是结合宋元时代背景,就现存的建筑遗物作论述的,忽视了明清时期历史嬗变对泉州天后宫建筑文物的影响。结合自宋至清的长时段历史嬗变来看,我们认为该宫对于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支撑作用,还表现在文物的真实性和人民性两方面。

自从宋至清泉州天后宫的历史嬗变来看,历代王



图九 清嘉庆徐汝澜《重修天后宫碑记》石碑

朝与地方官府都曾是该宫的支持者。天后宫创建时只是民间小庙,但官方将其纳入祀典后,就必须按照朝廷祀典规制,对天后宫进行改建。宋元时期天后宫改建的情况,史料无证,但明清以后的重修庙记中,一方面强调在元代的基础上有所扩建,如万历《泉州府志》称,郑和下西洋时“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拓之,而宫宇益崇”。明初在元代规制基础上进行了扩建,使得天后宫的规格更高,规模更加宏伟壮观。另一方面是重修时刻意强调要维持明永乐扩建后的规制,如顾珀《重修泉州天妃宫记》称,在徐概主持下,“先修正殿五间,重建寝殿七间,凉亭四座,西廊三十间,东西轩及斋馆二十八楹”(图六、图七、图八)^③。“修”“重建”等词,表明是按照原来规制加以修复,而非新建或拓建。

清嘉庆年间的那次重修也是这样,“朽者易之,缺者补之,自内至外,治以塋茨,节以丹雘,而殿之大柱,并易以石,以期不朽,亦庶几轮焉奂焉,克符旧制矣”。这次重修,更换破损构件,重新装彩,将大殿木柱改为石柱,以求“克符旧制”(图九、图一〇、图一一)。根据以上记述,我们可以推论,经过明嘉靖和清嘉庆两次大修,泉州天后宫仍然保持着明永乐郑和拓建时的规制。而郑和奏请福建守镇官拓建,肯定又是在元代规制基础上进行的。即元明建筑规制和风格一直得到了保持。今天的天后宫坐北朝南,总占地面积72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分布于南北中轴线及其两侧,依次有山门、戏台、东西阙、正殿、东西廊、四凉亭、东西轩、两



图八 泉州天后宫藏明代镇殿妈祖玉圭

斋馆、寝殿和梳妆楼等组成,构成主从有序、中轴对称的以正殿为核心的庙宇建筑群。这样的建筑规制和风格,毫无疑问就是元明时代天后宫原貌的再现。

众所周知,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保护文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年)指出,“对文化遗产的所有形式与历史时期加以保护是遗产价值的根本。我们了解这些价值的能力部分取决于这些价值的信息来源是否真实可靠。对这些与文化遗产的最初与后续特征有关的信息来源及其意义的认识

与了解是全面评估真实性的必备基础……对于真实性的了解在所有有关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世界遗产公约》与其他遗产名单收录程序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基本作用。”^④可见,文物本身是否具有真实性,是文物价值的主要表现。不仅在文物研究、保护和修复中要注意文物真实性,在文化遗产名单收录程序中也要重视文物真实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报的是世界文化遗产,对文物真实性的要求极高。泉州天后宫几乎完整延续了元明时代的建筑规制与风格,对于此次申遗来说,在文物真实性方面非常具有说服力。

其次,文化遗产申报中强调文物的人民性。《威尼斯宪章》(1964年)中提到,“世代代人民的历史文物建筑,饱含着从过去的年月传下来的信息,是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动见证”^⑤。泉州天后宫是宋元时期起源于泉州本地的祭祀建筑,见证了妈祖信仰伴随海洋贸易而兴衰嬗变的历史过程,体现出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对海洋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自宋以来,不仅历代王朝和地方官方一直在泉州天后宫内活动,广大的基层民众也一直活跃于泉州天后宫内。泉州天后宫是由民众自发创建的,明中叶以后,在泉州天后宫年久失修的情况下,是泉州民众自发起来按照旧制进行修复,使得天后宫得以在官方力量撤出之后继续保持官方规制。清代天后宫列入泉州官府的春秋祀典,但仍是民众祭拜祈福之场所。当泉州知府徐汝澜倡建时,泉州民众纷纷出钱出力,踊跃加入重修行列中。直至今日,泉州天后宫仍然是泉州地方妈祖信众膜拜妈祖、祈求平安顺遂的地方,也是台湾乃至全世界妈祖信众谒祖、进香、朝圣的场所。官民双方的共同参与,使得天后宫的支持群体具有包容各个社会群体的人民性特征。也就是说,千余年来,泉州天后宫一直



图一〇 泉州天后宫藏清代“敕封天上圣母”木牌



图一一 泉州天后宫正殿后照壁清代《敕封天上圣母图》

是中国民众千百年传统的见证。这种广泛的人民性存在,不仅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提供支撑,而且也今天泉州天后宫的活化利用提供了便利。例如,20世纪80年代泉州天后宫以“闽台关系史博物馆”的名义恢复时,许多台湾妈祖信众就主动找上门来,希望恢复该宫的宗教信仰活动。1990年3月7日,由台湾新港奉天宫捐资、泉州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卢思立雕塑的天后金身,举行隆重的开光典礼盛会,标志着泉州天后宫宗教功能的正式恢复。自此之后,我国大陆、台湾、东南亚各地妈祖信众纷至沓来,泉州天后宫香火日趋鼎盛。

综上,我们从历时性的角度描述了自宋至清泉州天后宫的历史嬗变,阐释了天后宫妈祖信仰与我国海洋文化相生相长的事实。文章认为只有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天后宫建筑规制和风格形成的历史过程,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泉州天后宫的文物价值。从长时段历史来看,明清时期天后宫的重修、拓建刻意维持了元明时期的建筑规制和风格,使得该宫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的组合遗产点之一,具有了文物真实性的特点。而自宋至清朝廷、地方官方和基层信众积极活跃于天后宫的舞台,使得该宫作为申遗的遗产点具有了人民性的特点。我们相信,文物真实性和人民性的两方面特点,对于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来说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注释:

- ①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第16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
- ②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石刻·前言》,第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 ③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第15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
- ④蒋维钺、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汇编(第一辑)·碑记卷》,第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 ⑤蒋维钺、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汇编(第一辑)·散文卷》,第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 ⑥隆庆《泉州府志》,转引自《泉州天后宫志》,第100页,闽南文化出版社,2016年。
- ⑦庄弥邵:《罗城外壕记》,转引自泉州海外史博物馆调查组:《天后史迹的初步调查》,《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50页。
- ⑧(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50),载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700种),第958、96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 ⑨关于此次敕封,也有学者认为是《元史》误作,因元宋勃《顺济庙记》、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中提到元朝首封

妈祖,是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而不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

- ⑩蒋维钺、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汇编(第一辑)·档案卷》,第3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 ⑪转引自《泉州天后宫志》,第110页,闽南文化出版社,2016年。
- ⑫蒋维钺、周金琰辑纂:《妈祖文献汇编(第一辑)·档案卷》,第6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 ⑬李少园:《闽南文化风貌探寻录》,第1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⑭《万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杂志·寺观宫庙类》。
- ⑮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专辑》第22册,第38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 ⑯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第381~38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 ⑰蒋维钺、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汇编(第一辑)·碑记卷》,第6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 ⑱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第38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 ⑲蒋维钺、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汇编(第一辑)·碑记卷》,第6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 ⑳蒋维钺、郑丽航辑纂:《妈祖文献汇编(第一辑)·碑记卷》,第61~62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 ㉑(清)周学曾等纂修:《晋江县志》(卷十五)《祀典志》,第42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 ㉒(清)周学曾等纂修:《晋江县志》(卷十六)《祠庙志》,第42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 ㉓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第38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 ㉔奈良真实性文件,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88%E8%89%AF%E7%9C%9F%E5%AE%9E%E6%80%A7%E6%96%87%E4%BB%B6/14593679?fr=aladdin>。
- ㉕转引自徐雁飞、王磊:《论文物建筑保护中的“真实性”——读<威尼斯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和<北京文件>》,《建筑学报》2011年第S1期,第85页。

(责任编辑:周广明)